



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

The group of Taiyuan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Medieval China

范兆飞 著

中华书局



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

The group of Taiyuan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Medieval China

范兆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太原土族群体研究/范兆飞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4.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10035-8

I. 中… II. 范… III. 贵族-群体-研究-太原市-中古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5323 号



-
- 书 名 中古太原土族群体研究
著 者 范兆飞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郭 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331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035-8
定 价 62.00 元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河东地区在中国北方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由西向东流淌的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改变方向，自北向南，把河东同关中分割开来，因为在黄河之东，故称“河东”，唐代以来指的大约就是今日的山西省。

河东有两条大山脉，自北向南，东面是太行山，西面是吕梁山，从飞机上面往下看，山西呈现出山连着山的样貌，蜿蜒曲折，绵延不绝。

一条大河，两道山脉，把中国的北方分割成为东西两部分，太行山以东，唐以后称为“山东”，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延伸入海；西渡黄河，是关中盆地，连接陇右，通往中亚。河东恰好居于东西之中，从地缘、人缘直至古代政治社会都别具一格。

之所以别具一格，首先是因为从地理上它并不只是区分东西的线性地带，从太行山到吕梁山构成相当宽度的山区，使得人流、物流并不只是简单的通过，而有了足够的空间让它发展，内生的和外源的因素在此融合，关中与山东两大区块左右逢源，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

其次，崎岖的山地，使得这一带的流动性不高，人与物容易在此沉淀下来，深深扎根。而且，各个民族所具有的风俗传统，也一道保存赓续。这就是为什么山西拥有中国最多的地面文物的重要原因。然而，我更加重视此地保存着古代各个民族的后裔，不但是文物的博物馆，更是古代人类绵延不绝的天地。

复次，在太行和吕梁山脉之间，夹着一块平原，成为控扼这片战略要地的据点，商贾汇聚，地灵人杰，遂为人文荟萃之都，古称“并州”，是最古老的“九州”之一，蔚然大国。

自古以来，北方草原的民族南下，经常选择从雁门突破，夺取并州，把北方断为两截。因此，并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设

置重镇。历史和地缘的条件,以及现实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并州不仅是资源集中之地,而且是农业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与民族接触碰撞之处。

足够的空间,相对封闭的山区,闭关成国,开门辐辏,其腹地虽不足以领袖全国,却足以独树一帜。关中与山东交争,竞相拉拢河东,使之在东西对峙中举足轻重。东汉灭亡以后的政局走向,将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周以关中弱旅对抗强大的北齐,实赖河东大姓的有力支持,我曾经多次到山西稷山县考察,提取古代鲜卑族的基因样本,这里是当时称作“玉壁”的地方,高欢以数十万雄师西征,竟然挫折于此,留下数十米高的尸骨,粼粼白骨,历历在目。唐朝的崛起,其主要的支撑力量,与其说是有待证明的“关陇集团”,不如说是实实在在的关中与河东大家世族的结合。

由此可知,河东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当地世家大族具有很强的在乡性,稳固而坚韧,不易动摇;河东人对于本地文化的认同而形成的归属感,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强化了世家大族。

魏晋隋唐历史时期,土族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分裂动乱与国家权力的瓦解,令强者崛起于乡间,汉代形成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集团全面洗牌,依赖于朝廷的城市权贵没落了,组织民众自成势力的在乡性土族成为左右政局的势力。魏晋时代深深扎根于乡村的土族,并不是两汉权贵家族的延续,他们之间有着明显且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汉族、胡族,各个政权都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才能稳固,土族成为国家首先考量的要素。两者之间虽然不时有利益冲突,但是,结果往往是朝廷对于个人乃至房支的追究,最后演变为与其宗族妥协,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的奥秘。根本原因在于这时期的土族拥有强大的地方社会势力。国家同土族相互依存,各自的权力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约,国家治乱、家族盛衰同两者之间的力量消长,及其相互关系的处理密切关联。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有力地制约着朝廷走向专制,构成这一时期政治的又一特点。

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必须深入了解土族,从其来龙去脉到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弄得一清二楚,据此给他们定位,纳入国家政治秩序之中。土族与国家共同维护谱牒,是双方的政治基石。这个传统到唐朝以后随着土族政治的衰微而发生重大改变,谱学从庙堂跌落为民间事业,越往近代走,人们对于昔日氏族的荣耀和谱学的意义越发隔膜,乃至模糊不清,误会萌生。

从魏晋到唐朝,谱学兴盛具有官方的背景,对人物家世的分辨是选官的

基础。宋代以后,土族政治衰微,编纂族谱基本上属于民间事业,认祖归宗,辨析源流,相当程度上也是对旧日荣光的自我夸耀和依稀残梦。近代社会革命,彻底打碎了身份等级,把门阀观念也一起扫除。因此,学者们对于名门大姓变得相当的陌生,也不太关注。

我们的近邻日本却不一样,这是一个从身份等级森严的武士社会跨入近代的国家,其“华族”与门第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变革的进程。所以,内藤湖南等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学者,用他们所熟悉的日本社会现状及其观念来考察中国,自然而然把土族问题作为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的钥匙,开展研究。其实,无论是京都学派,还是东京学派,都是站在日本的角度,用日本史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所谓的“豪族”,或者是“古代”与“中世”的时代区分,都源于日本史。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关键点,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走进日本学者的窠臼中去,还以为中国古代土族的研究是日本学者所创立的,忘记了这才是中国古代研究最为透彻的领域。

至于欧美学者,其社会形态与中国相去甚远,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多受日本学术的影响,容易看到与其不同的差异性,加上他们所擅长的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不无启发。

中国近现代对于传统的破除非常彻底,学统传承基本打断了,现在重起炉灶,不知往哪里接续。孔子说“礼失求诸野”。欧美理论的引入,日本考证的模仿,引远水以解近渴,在摸索中开展新的探索。国外学术的借鉴当然是促进研究蓬勃发展的重要方面,然而,更加重要的是自己要有本,要有根,必须对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国际学术界有所洞察,才不至于随风起伏。

因此,扎扎实实地研读古代文献,选取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地区,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个地区的社会存在形态,土族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在时代剧变中的跌宕起伏,考察他们同国家与社会的呼应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

范兆飞博士来自太原,熟悉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在古代文献史料上下了很多功夫,立志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土族门阀政治,并且做了很多学术准备,大量搜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梳理脉络,颇有感悟。

近些年来,土族的个案研究颇为流行,国内海外,不乏成例。如何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寻找突破点呢?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孤立的,既要掌握文献,更要有阅历和悟性。兆飞选取了他最为熟悉的河东地区,大有斩获。而

且,他花费了很多时间,走出书斋,在山西各处实地考察,广泛收集考古成果,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从时间的轴线,研究东汉灭亡以来河东士族的变迁,又从空间的轴线,考察河东士族的兴衰与存在形态,用大量的实证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做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我曾经建议他多考察士族之间通过婚姻结成的网络,因为孤立地看待士族是偏颇的,而且难以深入到其内里,尤其在河东这块颇有封闭性色彩的地区。说说容易,做起来甚难。兆飞在传世文献中难以找到足够的材料,便把眼光投向墓志,搜集考证,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用联系的观点,从群体的角度把握一个地区的士族,给士族个案研究的现状另辟蹊径。

河东士族在北周隋唐的政局演变中举足轻重,要了解其前因后果,本书就是很值得阅读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已经完成多年了,研究者常常因为读不到而成为憾事。现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满足了学术界多年的需求,又推动了学术的进步。我也借此表达祝贺,相信学界对此课题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

韩昇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于上海悟证堂

目 录

序	韩昇 1
绪 论	1
第一节 贵族政治与寄生官僚:日本两大学派的交锋	2
第二节 多元模式与范式束缚:土族研究理论的演变	8
第三节 本书研究思路及内容	18
第一章 东汉太原大姓势力的形成	25
第一节 郭泰品评与太原士人	26
第二节 汉末太原大族次序之竞争	32
第三节 结论	38
第二章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与太原士族群的升降	44
第一节 亲曹反马与家族零落:以太原令狐氏为例	45
第二节 政治倾向的动态转变:以太原郭氏为例	48
第三节 叛曹亲马与士族上升:以太原孙氏和王氏为例	57
第四节 结论	60
第三章 西晋太原士族交游网络的凝结	61
第一节 《华芳墓志》与王氏婚姻圈	62
第二节 太原士族群交游网络的凝成	70
第三节 结论	79
第四章 西晋末年的太原士族群与北方局势的演变	82
第一节 刘琨刺并之政治背景	83
第二节 刘琨刺并之力量凭借	88
第三节 刘琨刺并之经营策略	94

第四节	刘琨卒后之声名浮沉	99
第五节	王浚经营河北之力量凭借	104
第六节	刘琨和王浚督镇之比较	112
第七节	结论	115
第五章	北魏太原士族群体的集体复兴	118
第一节	太原郭氏的复兴道路	119
第二节	血统真伪与并州首望之争	122
第三节	墓志所见太原士族婚姻圈之重塑	131
第四节	结论	137
第六章	北朝东西政权之对峙与太原士族群体的动向	140
第一节	椎冰故事和东西政权攻守转换	142
第二节	太原王氏人物之动向	150
第三节	太原郭氏人物之动向	158
第四节	其他家族人物之动向	162
第五节	结论	164
第七章	《晋阳造像颂》所见隋代太原家族格局的变迁	166
第一节	《晋阳造像颂》	167
第二节	隋代太原家族的多样性	170
第三节	结论	177
第八章	唐代太原士族的婚姻关系与门第消融	179
第一节	太原四房王氏之婚姻	180
第二节	王氏旁门枝叶之婚姻	186
第三节	其他太原士族之婚姻	192
第四节	结论	197
附录一	隋唐士族迁徙个案研究	
——以太原郭氏为例		224
第一节	郭氏迁往东都者考	225
第二节	郭氏迁往西京者考	236
第三节	郭氏滞留并州者考	244
第四节	结论	247

附录二 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

——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 254

第一节 六朝太原王氏的祖先记忆 255

第二节 唐代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 263

第三节 结论 271

附录三 史料批评、文本解读与中古士族政治史研究

——评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275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07

绪 论

中古士族研究是中古史学术领域的传统课题,士族在魏晋隋唐的社会中举足轻重,不论中外学界对士族政治发端和终结的时间界定有何歧异纷争,都必须承认士族在魏晋隋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①因此,对士族阶层的研究无疑是领悟中古政治力量变迁及社会转型的有效途径。^②魏晋隋唐的社会性质不同于先秦两汉,该时期承前启后,别具特色。^③士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发轫于两汉,蕴积于魏晋,勃兴于六朝,消融于唐宋之际。士族在中古时期世居高官,簪缨相袭,婚配高门,地位显赫,在某些时期甚至与皇权分庭抗礼,其成立要件即为学术中心由国家太学转移至地方之世家大族,学术文化成为士族的专有物,从而使得谙熟于治理国家的士族阶层占据国家官吏的大多数,进而通过九品中正制控制国家官吏的选拔权。在传统中国,皇帝、贵族和官僚三者之间的关系,微妙隐晦,交错鲜明。一般规律是,贵族权

^① 参见蒙思明:《六朝世族形成的经过》,《文史杂志》第1卷第9期,1941年,第1-22页。另外,蒙氏在遗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一书中,通篇以士族为线索进行展开,并在绪言中声称:“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实即一部世族兴衰史,故本作品谓为魏晋南北朝之世族固然名实相符,即视为魏晋南北朝史大纲亦无不可。”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另外,陶希圣也认为中国中古时期的政体为“士族政治”,参见氏著:《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册,台北:食货出版社,1954年。

^② 清人认为史家所讨论者有三端:舆地、官制和氏族。参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8页。钱氏又言:“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参见《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北史·外戚传》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46页。

^③ 当然,就中国古代史的分期而言,中外学界一度争论极大,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经济史观,主张战国封建论,其他还有何兹全、唐长孺等先生主张的魏晋封建论;二是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文化史观,主张将中国古代分为古代帝国、中世(贵族制)和近世三段。另外,阎步克先生在授课时,还从制度史的角度观照古史分期,将中国古代史分为王国时代和官僚帝国时代。这是2011年冬笔者在北大访学时的课堂上听到的。从士族阶层存在的特殊性和时代性而言,笔者在考察中古士族阶层问题时采用内藤湖南的分期方法。

力愈强,皇权和官僚权力愈弱;贵族权力愈弱,皇权和官僚权力则愈强。中古时期的皇权、贵族和官僚三种力量的强弱变化,是否足以影响到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学人之间,似乎并没有形成基本共识,昭示后来者仍有继续从事研究中古土族问题的必要性。兼以近年中古石刻资料的大量发现以及整理成果的新鲜出炉,也为这种问题意识提供了若干契机。绪论部分旨在系统梳理、总结和反思中古土族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方法,就中古土族可能开展的领域略陈管见,并简要介绍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基本内容。

第一节 贵族政治与寄生官僚:日本两大学派的交锋

19、20世纪之交正处于新旧学术转型和现代学术建立的时代,在这个史学脉络和国际视野中,研究中国中古土族问题最早、影响最大的学者莫过于20世纪初叶日本京都学派的奠基者内藤湖南。内藤氏立足中西比较的文化史观,揭橥“唐宋变革论”和“六朝隋唐贵族制论”,特意强调六朝贵族的独立性、自律性以及六朝社会不同于其他时代的贵族特征,其核心观点是:“六朝至唐中叶,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与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同,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亦没有关系。这个时期的贵族制度,并不是由天子赐予人民领土,而是由地方有名望的家族长期自然相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世家,亦就是所谓郡望的自体。”^①内藤氏强调的正是贵族制度自有渊源,其权力、土地、声望等社会资源与皇权无涉。实际上,如果往前追溯,宋人沈括已体察到唐宋之间的巨大变化,以及家族门阀在南北朝隋唐的政治社会中举足轻重:“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之,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陇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靖恭杨之

^①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收于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

类,自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①沈括强调中古郡望显贵的社会风俗,内藤湖南则看重中古士族权力的内生性特征,两氏所论,不过是中古士族卓然自立现象的一体两面。

但是,就中古士族研究的现实影响而言,无疑是内藤湖南的学说影响更大,学界誉为“内藤假说”、“唐宋变革论”等等。^②其后,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欧美学界,一大批学人在其理论上进行阐释、补充、验证和修订。在日本学界,主要体现为京都学派的学者对“内藤假说”的验证和发挥。20世纪30年代,内藤氏的弟子冈崎文夫继续发挥和深化内藤氏的观点,但也意识到北魏异族统治背景下的皇权复兴,从而使名门望族的政治权力处于“被监视”的境地。^③冈崎氏注意到在六朝贵族政治的大背景下,士族同样具有历时性的特征: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势力和权威尽管得以维持,但并未形成如南朝一样森严的贵族制。冈崎氏还从文武分途的角度,将士族分为重武的勋门和重文的氏族。^④

50年代,冈崎文夫之后,亲炙内藤氏学术衣钵的宫崎市定,从选官制度的角度将内藤假说演绎到极为深入的境界。宫崎市定发现,六朝人物政治权力的来源,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和官僚机构,而是一脉相承的高贵血统,担任官职的高低清浊,取决于门第的贵贱,以及血统的尊卑。宫崎市定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贵族子弟的起家官品,与乡品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具体言之,乡品和起家官品之间大致相差四级;不仅如此,宫崎市定还认为,乡品的意义不仅决定贵族子弟的起家官品,还决定其日后所任官职的最高限度。^⑤如此这般,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在一千多年后的六朝时代重新得以复

① 沈括:《梦溪笔谈校证》卷二四,胡道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72-773页。

②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1页。还可参见福原启郎:《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通过〈支那中古的文化〉的分析》,胡宝华译,收于内藤湖南研究会编:《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7-286页。

③ 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东京:弘文堂,1932年;《北魏的中正制度》,收于《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东京:弘文堂,1935年,第221页。

④ 冈崎文夫:《南朝贵族制的一个方面》,收于《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东京:弘文堂,1935年。

⑤ 宫崎市定:《晋武帝户调式研究》,原载《东亚经济研究》第19卷第4号,1935年,中译文见于氏著:《西晋户调式研究》,夏日新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109-133页;《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6页。

活和回归,核心表现就是在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上,血缘重新占据一席之地。六朝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等现在看来是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的政治抱负,恰好正是这个时代高贵血统决定任官高低的鲜活反映。宇都宫清吉认为,秦汉时期的帝国构造是皇权与民众的二元对立,而六朝时代的“民”则划分为豪族和庶民,豪族在此意义上承担着沟通皇权与民众的“中间层”作用,豪族卓然成长为皇权和民众之外的第三支力量。宇都宫氏格外强调六朝时代的特殊性,“相对于秦汉时代的政治性,统领六朝时代所有事物的是自律性”,但他同时强调隋唐的时代格,“不仅是近的自律的六朝时代的一种历史展开,也是远的政治的秦汉时代的一种新展开”^①。换言之,宇都宫氏一方面强调六朝时代的特殊性和自成系统,但是又似乎强调六朝时代在大一统的秦汉和隋唐帝国之间的衔接背景和过渡意义。

60年代以降,京都学人在中古士族研究上的主要推进,以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为代表:两氏分别以十六国北朝和汉魏六朝为研究时段,可谓分工明确,旗帜鲜明。谷川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是提出“豪族共同体”理论。所谓的“豪族共同体”,是以望族中的特定之家为中心的宗族和乡党的地方性团结,尤其以贵族赈济民众的现实善举为核心,结合其学问、伦理、文学等精神素养,贵族具有控制乡党的独立品格,由此成为领导者,进而自立于官方朝廷之外。^② 贵族通过九品中正制的保驾护航,世代把持政治特权,实现贵族对朝廷权威的超越和控制。六朝士族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寡头阶层:既笼络了乡里社会的民众,也控制了高高在上的朝廷。异曲同工的是,川胜义雄亦格外重视乡论的影响,认为正是乡论的普遍存在,才有效遏制了地方豪族领主化的倾向,从而构成士大夫自立自律的基础;同时认为门生故吏既是人格上的依附关系,也是恩义关系,并指出六朝就是这种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③ 谷川、川胜二氏的论说在日本学界产生极大震动,并引发广泛激烈

^① 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第122-134页。

^②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1-106页;同氏:《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③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夏日新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1-35页;《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芄、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的学术争鸣。国内有的学人对谷川氏的研究成果予以极高的评价,^①实际上,即便中日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之后,谷川氏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大陆学界也没有产生预料之中的影响。^②有必要指出,“豪族共同体”脱胎于日本学界风靡一时的“社会共同体”问题的讨论。在“豪族共同体”或“村落共同体”等共同体理论框架内进行中古士族研究的大陆学人,或继续推进者,或激烈批评者,寥寥无几。

在验证内藤假说的后继者中间,个案研究的方法是学者广为采用的一种,时至今日,个案研究几乎是学人研究中古士族问题的不二法门。那么,士族个案研究的前世今生如何?追根溯源,日本守屋美都雄援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之法,展开汉唐时期太原王氏家族的个案考察,是中古士族个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守屋氏明确说明其研究意图是通过研究太原王氏家族崛起与衰落的历史过程,从而考察中国门阀制的变迁及其向官僚制的演变。守屋氏特意提示,六朝门阀大族逐渐丧失在政治世界的卓越地位,仅沦为社会崇拜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守屋氏进而指出:“中古门阀衰落的原因是:一、科举制之实行;二、旧族向官僚之转变;三、新兴官僚阶层之崛起;四、儒家仪礼及事业被新兴官僚所独占。”^③但是,守屋氏还提出:“是否适用于其他门阀大族,有赖于对其他家族的继续考察。”遗憾的是,守屋氏之后再没有从事士族个案研究。

应该说,守屋氏的个案研究从社会细胞及政治家族的角度,将从文化史观出发的内藤假说落到了社会的基本层面,同时也为士族研究开辟了一条堪称研究范式的道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不是所有中古家族的演变历程都可以验证内藤假说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日本学界,以六朝贵族制研究为学术根基的“京都学派”很快就遭到炮火猛烈的学术批评。^④与其开兵见仗的“东京学派”,极为重视传统中国社会发展所具

① 李济沧:《论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35-153页。

② 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收于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97-408页。

③ 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东京: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

④ 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社会和国家》,《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

有的同质性和连续性,^①强调皇权的传统影响,认为魏晋隋唐社会是古代社会的延长和继续,从而对京都学人一贯主张的六朝贵族说进行尖锐批评。^②当然,两大学派论战的主战场是关于中国历史分期及其根本性质认识的巨大分歧,关于六朝是贵族制抑或官僚制的争论仅是其中的一翼。京都学人强调乡里舆论对士族的影响、士族的精神作用及其对社会的主导作用,由此在乡里社会形成一个所谓的“自治的世界”,从而与皇权主导的“政治的世界”分庭抗礼。东京学派与之截然不同。矢野主税认为不应夸大六朝贵族的政治力量,反而提出六朝贵族的政治力量来源于皇权、经济生活依赖于俸禄、社会活动附庸于官僚机器的观点,即“贵族即寄生官僚论”。

矢野主税的学术论点建立在一系列士族个案研究的学术基础之上。守屋氏尽管开创了士族研究的范式,但从他本人后来再无任何士族个案研究的学术兴趣观察,这个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壮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矢野主税的继承、发挥和批评。守屋氏研究太原王氏的著作甫一出版,赞誉如潮,追随者的研究成果,在三五年之后就已面世。矢野氏对中古大族如张氏、裴氏、郑氏、韦氏等不同类型的家族及门阀社会进行研究,前后持续的研究时间将近二十年之久。矢野氏在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甲族、寒门的区别绝不是绝对化的,可以得知以颁授官职为基准,其界限很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指出,同一士族的不同子弟都有士庶之别,评价的标准正在于担任官职的高低。他还提出:“从祖辈传承获得的特权地位,即便是最高层的门阀,也绝不是能够无条件的接受传承下去。”^③矢野氏强调中央政权所赋予的官职和地位是门阀世族形成的主因,即士族的兴盛建立在蝉联官位的基础上,而官爵为朝廷所授予,这正是矢野氏一系列士族个案研究的问题意识。

① 佐竹靖彦将持京都派学说的学者称为“世界史派”,将其对立面东京派(即历研派)的学者称为“基本法则派”,参见氏著:《中国古代的共同体与共同体论》,《佐竹靖彦史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9页。

②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3部“转折和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 矢野主税:《张氏研究稿》,《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1955年第5期;《郑氏研究》第1-3期,分载《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8-10期,1958、1959、1960年;《韦氏研究》1、2,分载《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1期、增刊,1961、1962年;《裴氏研究》,载于《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4期,1965年;《试论门阀贵族的系谱》,《古代学》第7卷第1号,1958年。矢野主税:《魏晋百官世系表》(改订本),长崎:长崎大学史学会,1971年。最能体现矢野主税观点的著作是氏著:《门阀社会成立史》,东京:株式会社国书刊行会,1976年。